

简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绿发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再审监督案

（法学院 徐康辉 2120191993）

一、案情简介

绿发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瑞泰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违规将超标废水直接排入蒸发池，造成腾格里沙漠严重污染，截至起诉时仍然没有整改完毕。一审法院认为：绿发会的宗旨与业务范围虽然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其章程中并未确定该基金会同时具备《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的“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且该基金会的等级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也没有从事环境保护的业务，故绿发会不能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因此，裁定对绿发会的起诉不予受理。

绿发会不服一审裁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未能正确理解“环境”及“环境保护”道德概念，从而错误得出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没有“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结论。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绿发会不服二审裁定，向最高院申请再审，请求：（一）撤销一审裁定和二审裁定；（二）依法受理绿发会的起诉。最高院认为本案应围绕绿发会是否系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这一焦点进行审理，而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所以，对于本案绿发会是否可以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提起本案诉讼，应重点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审查。经审理，最高院认为本案一审、二审的裁定认定绿发会不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系对环境保护法、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以及环境保护内涵的不当理解所致，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纠正。裁定本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①

二、法律中“环境”的定义

^①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在本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绿发会不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活动的公益组织,因而认定其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裁定对绿发会的诉讼不予受理。所以,本案给我们的启发是需要明晰环境保护以及法律中环境的定义。另外,概念是法学研究的起点,所谓法律,也是对一系列术语的解释。环境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其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独特的视角、方法和价值观,了解环境法的内涵,首先还是应该从环境法上最核心的概念“环境”开始。

传统法律关注的是环境的各种“有用的”要素,包括土地、森林、草原、水域、矿藏资源、动物、植物等,对于“环境”没有整体的认识,更缺乏对“环境”生态属性的整体定位和界定。法律对于环境的整体关注起因于环境问题的明显,并对人们的利益构成了威胁或者危害。环境法产生后,“环境”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在法律中有了自己的内涵、地位和属性。与传统法律界定环境要素的目的和角度有极大的区别,环境立法对“环境”进行定义不是以确定权利界线或者物的权属为目的,而是为了明确环境法的保护对象,这一对象呈现出立体性、多层次性、多因素性和系统性等特点。^①各国环境法对“环境”的表述通常采取概括加具体的形式。概括性的规定是希望能将环境的特性描述出来,使之能涵盖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活动扩张,人类对自然界影响的扩大而导致环境保护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列举行的规定使得环境法保护对象更为具体明确,有利于明确法律的任务和目标。

我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的界定反映出了环境的一般立法特征,但是该定义对于“环境”的内在价值和特性反映不够,没有体现出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性和环境的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载《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中樞、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环境要素相互关系的理解非常深刻,也非常朴素。

另有学者认为,当前的环境科学之环境概念认为,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

^① 李挚萍:《环境法基本法中“环境”定义的考究》,载《政法论丛》,2014年第3期。

部世界，即人类生存、繁衍所需的相应的环境或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它采用人、物二分的方法，说明环境科学只研究人之环境，只有人才存在环境问题。不过，这却与环境科学的实际发展不相符合。需要从法学角度重新定义环境概念：环境是生命体之间及其与非生命体之间基于生存的安全与持续而建立的所有关系状态。人的环境是人类与所有的生命体以及非生命体之间基于生存的安全与持续而建立的关系状态。^①

^① 张锋：《环境与环境资源法的变革——环境概念的重新诠释》，载《东岳论丛》，2007年第2期。